



湖南出土銅鏡圖錄

湖南出土銅鏡圖錄

湖南省博物館編

文物出版社

1960年5月

湖南出土銅鏡圖錄

湖南省博物館編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
(北京景山前街故宮內)

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25/32印張

196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000 統一書號：7068·145

定價：2.20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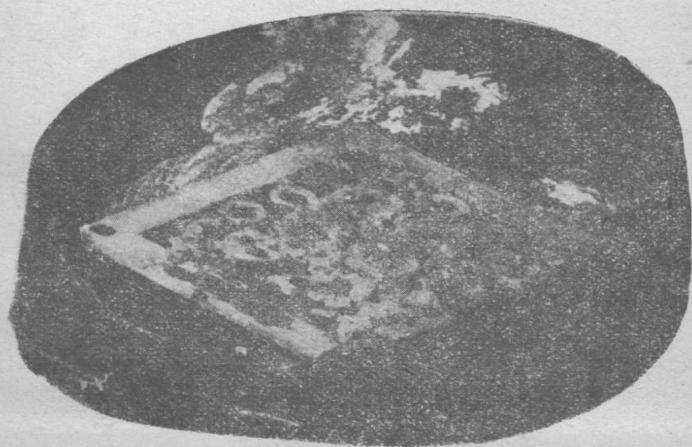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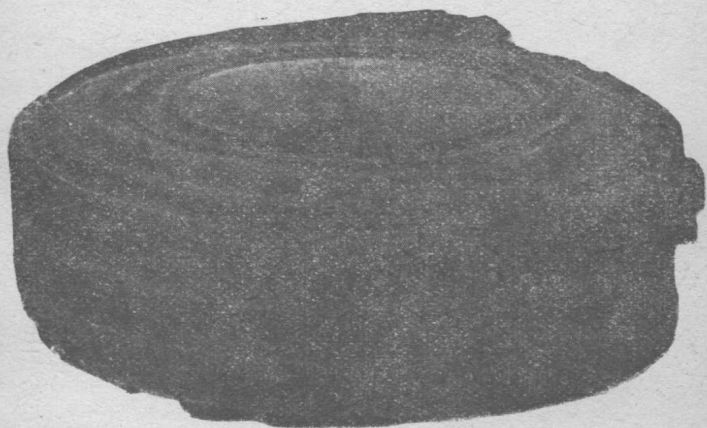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插图.....	(1)
二、概說.....	(5)
三、銅鏡出土墓葬登記表.....	(20)
四、图版.....	(27)
五、附录.....	(141)



插图一 顾愷之繪女史箴图之梳装部分



插图二 白沙宋墓壁画中的梳妆图



插图三 銅鏡与漆盒 战国

直径 20.3 厘米, 1954 年长沙枫树山墓 11 出土



插图四 铜镜与漆盒 战国

直径 21、高 9.5 厘米，1954 年长沙左家公山墓 15 出土

湖南省出土銅鏡概述

解放以來，湖南出土了數以百計的精美楚鏡和秦漢銅鏡。三國至宋的銅鏡，也有一些新的發現。這些銅鏡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不同的藝術風格，對研究我國古代裝飾藝術，是很好的資料。

銅鏡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隨着冶銅工業技術的高度發展而出現的。特別在楚國的範圍內發展得最快，漢、唐以來又一浪接一浪地得到了新的發展，至宋元以後才開始衰落。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，人們珍惜着它，這不僅僅是因為銅鏡是一種日常生活用品，更重要的是因為銅鏡本身有着強烈的藝術魅力。

銅鏡與其他青銅器一樣，是用一種合金體制成的。《考工記》說：“金有六齊……，金錫半，謂之鑒燧之齊。”關於銅鏡所含不同成分金屬的具體比例，1957年我們曾請湖南省工業試驗所化驗過，得出的結果是戰國時代黑色銅鏡的含銅量占71.74%，含錫量占19.623%，含鉛量占2.69%，其它鋅、鎳、鎳、鐵等雜質在1%以下。此外，我們又化驗了氧化後表面上變成玉綠色的銅鏡，其含銅量占66.88%，含錫量占21.992%，含鉛量占3.363%，鋅、鎳、鎳、鐵等雜質，在1%以下。從化驗結果來看，與《考工記》的記載

似有出入，但《考工記》主要是總結戰國以前的成果，我們這次的化驗可以補充《考工記》之不足，當然，時代和地區也各有其特點，這也必須加以說明的。唐代的銅鏡，由於所含鉛錫成分增多，所以多呈銀白色。宋代以後銅鏡的含錫量減少了，質地一般都不太好。

下面我們將解放後湖南歷年來所發掘的銅鏡作一個概括的介紹：

一、戰國時期：以楚鏡為代表。湖南楚鏡出土的地區，主要是長沙和衡陽兩處，常德、湘鄉亦出土過少量。

楚鏡的主要特征是胎質薄，三輪鈕，素卷緣，主紋下衬以地紋。鏡面氧化多呈黑色。圖案花紋採用弧凹面綫條、凸起折平的綫條，以及淺浮雕、鏤空等不同的雕刻手法。結構布局以四分法和二方連續法為最多。圖案有賓有主，簡單繁縟不一。表現方法有三種：一種是純地紋作裝飾；一種是既有主紋又有地紋的二重疊紋樣；還有一種是地紋與主紋間再夾隔一層簡單的紋飾，而成為一種三重疊紋樣，這是富於空間透視感的一種構圖形式。

楚鏡的種類大致可分為十一種：

1. 素鏡：多半出於春秋及戰國初期的墓葬里，圓形素面，個別的鏡緣微微卷起，背面一般都很粗糙，胎壁薄，色澤青灰或灰黃，純青色很少（圖一）。另外還有一種素鏡，常飾以匙面式的環帶，也有稱之為弦紋鏡的（圖二）。小型鏡多出於春秋戰國之際，大型的弦紋鏡則常常晚至秦末漢初。

2. 純地紋鏡：有羽狀紋、變形羽狀紋、云紋等。鏡鈕有三輪和四輪兩種，圓鈕座，作匙面形，或飾以綯索紋。外緣素卷或扁平，形制不大，直徑一般在10厘米左右。這種鏡子的時代相當於戰國中晚期。現在保存較好的有1954年長沙桂花園115號墓出土的羽狀紋鏡（圖四）、1955年長沙絲茅沖一區168號墓出土的變形羽狀紋鏡（圖五）、及1954年長沙桂花園2號墓出土的云錦紋鏡等（圖一〇）。這種鏡子地紋是用一個刻有地紋的小模子作四方連續模印而成的，范痕一般非常清楚。

3. 四葉紋鏡：出自戰國中晚期墓。圖案比較簡單，葉紋作絨球狀、團扇狀或楓葉狀，地紋以羽狀紋為主，間或使用云文。鏡鈕多作三輪狀，外緣素卷，鈕座有圓有方，方座多匙面，圓座多重圈，重圈素面凸起或飾以綯紋。四葉紋的變形，有的像佛像的背光，有的像團扇（圖七），有的狀如蟠桃（圖八），有的狀如云紋。其中云紋四葉紋鏡是最常見的一種，使用的時間也比較長。此外還有一種變形四葉紋鏡，在靠近外緣處又飾以四葉，合為八葉，地紋由S形云紋及回紋組成，狀如變形饕餮紋，這種鏡子出土的數量極少。

4. 山字紋鏡：或稱“T”字鏡、規矩紋鏡，是楚鏡中最常見的一種，出土量幾乎占楚鏡總數的70—80%。山字鏡中以四山鏡為最多，五山鏡是一種變形的鏡子，傳世品中也曾發現過六山鏡。山字鏡的地紋飾羽狀紋，空間處常以四出的連葉紋作為點綴。夾於地紋與主紋之間的圖案飾以菱

形紋。一般晚出的山字鏡在菱形图案的尖角上还側出卷尾，有的飾以水仙花或多角形小菱花。四山鏡是一种早期的鏡子，在衡阳的早期楚墓中与陶鬲共存，直到西汉初期还有小量的出土。五山鏡是战国晚期的新产品，长沙及常德两地都有出土（图一七、一八）。由于五山鏡多了一个山字，因而在鈕座与构图上，与四山鏡就有了显著的区别：四山鏡飾方形鈕座，五山鏡飾圓形鈕座；四山鏡主紋作对称式，五山鏡就打破了这个格式，而走向环轉形的新格式。

5. 方連紋鏡：又称菱形紋鏡。鏡鈕多作三輪式，以水仙花作鈕座。鏡緣窄小高卷，方連紋使用匙面寬綫条，作井字形构图，空間以水仙花作裝飾。地紋作淺浮雕，飾以羽狀紋，图案显得很清雅优美（图二〇）。較大的菱花鏡，在主紋与地紋之間还穿插着綫紋組成的米字形图案。后起的菱花鏡打破了井字形的构图法，而走向环形对称式的格式，水仙花形的鈕座亦以方形鈕座来代替了。这种变形的鏡子不多（图二一）。菱花鏡的时代晚于山字鏡。

6. 龙凤紋鏡：是战国晚期的一种新型銅鏡，綫条的使用与构图法都与山字鏡、方連紋鏡有所不同。龙凤紋鏡的特点是：寬卷緣，主紋变化很多，地紋飾以罗錦紋及云渦紋，圓形鈕座，除了三輪鈕外，又出現了刻花复瓦形小鈕和乳状小鈕。主紋組成环状形，龙紋分四組或三組。龙凤紋鏡的种类很多，有四叶龙紋鏡（图三五）、四叶凤紋鏡、四凤紋鏡、还有鏤空鏡鈕的三龙紋鏡（图三八）、及三凤紋鏡等。除了单独的龙凤紋銅鏡外，楚鏡中还流行一种龙

紋与龙紋、凤紋与凤紋纏繞在一起的鏡子，如纏繞式的四龙紋鏡、三龙紋鏡及三凤紋鏡等等。

以上所述的龙凤紋鏡，主紋都是寬平凸起的单綫条組成，在长沙地区的征集品中，曾有用短小断續的細綫条組成的蟠龙紋鏡。綫条組織形式与1958年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中出土的絲綢刺綉中的龙凤图案相同。

7. 方連紋凤鳥鏡：也是楚墓中晚出的一种鏡子。三輪鈕，匙面式寬緣，方形鈕座，角上四出凤鳥一只，四周飾方連紋，上立一小鳥，狀若鸚鵡。地紋飾云形菱格紋图案，这种鏡子湖南仅出土一面，四川成都亦曾出土过。

8. 兽紋鏡：兽紋鏡的图案是用細小的凸綫条組成的，像国画中的勾勒法，用强而有力的綫条勾出图案的主要外形。地紋飾羽狀紋。鏡鈕多半是三輪复瓦形，圓形匙面鈕座。主紋以长尾兽为主，有的作金魚形或簡化成变形云紋狀。兽紋鏡中有代表性的要算1952年长沙筲箕坡744号墓出土的鏡緣上繪有朱彩的羽狀紋地兽紋鏡（图二五），及1953年长沙月亮山55号墓出土的羽狀紋地牛面鼠耳形的兽紋鏡（图二四）。兽紋鏡的兽形变化多端，晚期的兽紋鏡往往被菱形云紋的图案所代替，或者演变为金魚尾式的图案（图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）。

9. 鏤空（透雕式）蟠螭紋鏡：其形制有方、圓两种，湖南均各只出一面。方鏡是1954年长沙楓树山11号墓出土的（图三），鏡背雕成螭紋，四角飾以乳釘，外緣素平，螭首有两角一鼻，螭身曲轉，形态不一，鏡面与鏡背是用两种

不同的金屬制成，鏡面含錫量多，質地堅硬，色澤青黑發漆光，鏡背質軟，已氧化成灰黃色；圓鏡是1952年長沙黃泥坑84號墓出土的，鏡鈕作復萼半球形，外緣扁平，主紋飾透雕蟠螭紋，鏡面與鏡背也是用兩種不同的青銅鑲合而成，背面已氧化殘碎。

10. 連弧紋鏡：是戰國末期的產物。主紋以匙面八弧紋為主，個別的有六弧、七弧和十弧等紋樣。地紋有龜裂紋、云紋和羅錦紋。鏡鈕多作三輪復瓦形，個別的作四輪復瓦形，圓形鈕座。外緣素卷或作匙面形微凹。1955年長沙絲茅沖一區24號墓出土的素地小凸稜條連弧紋鏡（圖四五）及1955年長沙陳家大山2號墓（圖四二）出土的云紋地連弧龍紋鏡可以作為代表。

11. 菱形龍鳳紋鏡：是晚期的產品，到西漢前期才大量流行起來。這種鏡子主紋以菱紋和龍鳳紋夾纏在一起，地紋以云渦紋為主，三輪鈕，多重圈綯紋圓座。1955年長沙廖家灣24號墓曾出土菱紋四龍紋鏡一面，可作為代表。1957年長沙左家塘25號墓也出土過，但龍紋已變作忍冬紋樣，是晚期的代表作品。

二、兩漢時期：漢鏡的主要特征就是銘文多，按其形制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，以秦末漢初的“大樂貴富”銘文鏡為代表。這種鏡子是處於楚鏡與漢鏡的交替時期，主要造型還保持了楚鏡的作風，銘文只是處於附屬地位。如1956年長沙子彈庫41號墓及1956年長沙燕子嘴3號墓出土的二面鏡子

(图四六、四七)，胎质薄，外緣高卷，主紋飾四叶蟠螭紋（或称云藻龙紋），复瓦形三輪鈕，鈕座亦飾以蟠龙，銘文作“大乐貴富，千秋万岁，宜酒食”。

第二阶段：以汉武帝以后的日光鏡和昭明鏡为代表。这个阶段的鏡子是以銘文为主，图案裝飾已处于次要地位。胎质較厚，形制較小，鈕形已变为半球形，外緣高出折平。昭明鏡的銘文一般为“內清质以昭明，光輝象乎日月，心勿揚而願忠，然雍塞而不泄”。但也有的略有差異，如“內清质以昭明，光日月，心忽揚而願忠，雍而不泄”（图五五），可能是有漏字。昭明鏡多以半球形鈕，連珠鈕座，高凸折平的边緣为其特征。其次是日光鏡。日光鏡有两种类型：一种类型与昭明鏡大致相同，外緣高隆折平，半球形鈕，圓形鈕座不飾連珠紋，座外飾連弧紋或重圈紋，銘文作“見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（图五二）；还有一种是草叶紋鏡，鏡鈕呈半球形，飾柿蒂紋鈕座，外緣飾連弧紋，主紋飾以草叶紋，銘文飾于方框內，銘文作：“見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。个别的鏡子既有昭明鏡的銘文，又有日光鏡的銘文，如1953年长沙子弹庫48号墓出土的銅鏡（图五四），鏡上有銘文两圈，內圈作“見日之光，长毋相忘”，外圈作“內清质以昭明，光輝象夫日月，心忽揚而願忠，然雍塞而不泄”。鏡子的造型，大致与昭明鏡相同。

属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交的銅鏡，銘文作“君行卒，予心（志）悲，久不見，侍前稀”（图四九），但这种鏡子出土量不多。

第三阶段：以新莽以后的銘文規矩鏡为代表。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鏡的邊緣上大量出現了图案花边，神仙禽兽等图案也逐漸大量出現。属于这个阶段的鏡子种类相当多，常見的有尙方鏡、姓氏鏡、长宜子孙鏡、位至三公鏡、汉有善銅鏡等等。

尙方鏡应是始于汉武帝，因为武帝時曾設有尙方官專門制造銅鏡，但帶有尙方作鏡銘文的鏡子，却一直到新莽時才开始出現。尙方鏡又称規矩鏡，因为这种鏡子的主紋是用“TLV”及变形的“TLV”規矩紋来裝飾的，TLV之間填以瑞鳥、羽人或四神，外緣飾鋸齒紋或折波紋，鈕形半圓，鈕座飾柿蒂紋，外緣飾銘文一圈，多簡体字。晚期的尙方鏡更有反写、漏字、掉字以致造成錯乱或語气不全的現象。銘文多半采用七言韵語的形式来表达祈禱的祝語和願望：如“尙方作鏡真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飢食枣”，这是一种最常見的形式。另有一种“尙方作鏡真大好，有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飢食枣”是属于掉字漏字的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图案比較复杂，銘文也比較长的鏡子，如“尙方作鏡真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飢食枣，浮游天下遨四海”（图六八）。鏡鈕作半球形，柿蒂紋鈕座，鋸齒折波紋外緣，鈕座外圍的方框內飾連珠形乳釘12枚（十二干支），主紋飾四神和凤鳥。这种形式的銅鏡，浙江紹兴曾出土过，并有銘鑄“始建国天凤二年”的年号，說明新莽時候它就流行起来了。

汉有善銅鏡，长江出土不多，这种鏡子制作頗精，1956

年长沙硯瓦池 2 号墓曾出土过一面(图六九), 直径达 22.2 厘米, 半球形鈕, 圓形鈕座, 鈕座內飾乳釘 9 枚, 鈕座外方框內飾乳釘 8 枚, 含义是代表“八子九孙居中央”。主紋飾黃龍、朱雀、白麟等象征祥瑞的紋飾和羽人图案, 外緣亦飾多种祥瑞图案, 銘文作“汉有善銅出丹阳, 取之为鏡清如明, 左龙右虎补四旁, 朱爵玄武順阴”。1956 年零陵四中工地 1 号墓出土的汉有善銅鏡的銘文比較完整, 銘文为“汉有善銅出丹阳, 左龙右虎僻不祥, 昭爵玄武利阴阳, 八子十二孙治中央, 法象天地, 如日月之光, 千秋万岁, 长乐未央兮”。鈕座周圍书“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”等十二地支。

乐未央鏡, 多半属于規矩鏡之类, 主紋以四神为主, 外緣多飾以流云(云藻)紋。

“长宜子孙”、“君宜高官”鏡, 以及“位至三公”鏡等都以連弧紋作裝飾, 主紋有两种类型: 一种飾带状罗錦紋的变形图案; 另一种飾蝠形柿蒂紋和凤紋。这种鏡子的时代, 大致自汉桓帝一直流傳到魏晉时期。

第四阶段: 以圓雕式神兽銘文鏡为代表, 这种神兽鏡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圓雕的手法来表現图案的主题, 鏡緣則开始用銘文来作裝飾, 或者用一顆顆印章式的銘文作为主紋的附加裝飾。常見的有青盖作鏡、侯氏或呂氏作鏡、日月天王鏡等。

青盖鏡构图的特点, 主紋多用圓雕的手法塑造神人、龙虎和鬬龙等, 邊緣多飾鋸齿折波紋, 半球形鈕, 无柿蒂